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

花钱的学问

石地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花钱的学问

石地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花钱的学问

石地 著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好些人有了好多钱。好事者经常在猜测中国到底有多少亿万富豪、多少千万富豪、多少百万富豪，《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更是把许多人的心撩拨得痒痒的。当然，究竟有多少富翁，永远不可能有准确答案。但中国有钱人与日俱增，却是不争的事实。什么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志？中国人严词谴责“金钱拜物教”的声音言犹在耳。本书是靠金钱富裕起来的状况下，关于价值观、道德、理想、美好生活的杂文集。

ISBN 978-7-89900-528-6

出版时间：2016 年 4 月

总 策 划：祁兰柱

责任编辑：余 红

封面设计：刘艳红

出版发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 55 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

邮 编：100010

Website: www.dajianet.com

E-mail: shuzichuanmeiapp@cnpubg.com

电 话：010-58110486

传 真：010-58110456

版 次：2016 年 4 月 第 1 版

字 数：73,788

定 价：2 元

ISBN 978-7-89900-528-6



目 录

第一章 我们怎么花钱

单纯

幸福的机会成本

为什么上大学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位置

管制与腐败

人情超级大国

第二章 流行是恶俗的通行证

还是因为穷

谁更需要关怀

一次转危为安的演讲

35岁——关注年龄歧视

为什么要比别人过得好

我们都在看着你

他会向总统说什么

遗憾的真实

第三章 依据不足的“热爱生活”

中国精英的生存状态

简单的道理

如果这是一份事业

解读“亚健康”

饥饿是什么滋味

明朗的航行

静水流深

幸福人

他为什么是富人

这样的老师你喜欢吗

第四章 尊重自己的公民

记忆不是为了恨

纪律与自由

杂感幸福

美女与野兽

有一种“爱”其实是害

生存智慧

道德的理想高度

“哭墙”无泪

珍惜

第一章 我们怎么花钱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好些人有了好多钱。好事者经常在猜测中国到底有多少亿万富豪、多少千万富豪、多少百万富豪,《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更是把许多人的心撩拨得痒痒的。当然,究竟有多少富翁,永远不可能有准确答案。但中国有钱人与日俱增,却是不争的事实。钱几乎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志。中国人严词谴责“金钱拜物教”的声音言犹在耳,转眼之间大亨就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和超级英雄。

这个变化非同小可。有了钱就要花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何花钱?钱应当花在什么地方?究竟是什么动机支配着中国人的花钱习惯或消费方式?经济学或其他学科对此似乎还没有系统性的解释。然而,花钱方式或消费模式却是对社会经济、教育、科技和文化(一句话,对人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

消费是经济学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斯密的《国富论》对当时英国国民的消费方式有细致入微的描述,他特别强调道德、宗教、社会习俗对消费的影响。穆勒第一个明确将政治经济学体系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理念是生产相对消费的过剩,根源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分配不公和生产“无计划的恶性竞争”,所以出路只能是“剥夺剥夺者”并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

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中心思想也是有效需求不足,不过他把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归咎于人们的悲观预期和政府推卸责任,只要政府积极担负起管理有效需求的职能,资本主义制度就有望顺利运转下去。凯恩斯之后研究消费的学者数不胜数,最著名的是佛里德曼和莫利格里安利。佛里德曼的贡献是“永久收入假说”,该假说认为人们的消费不取决于暂时收入,而是取决于永久收入(或是对永久收入的预期)。莫利格里安利的学说是“生命周期假说”。说人们的消费不是决定于短期收入,而是取决于一生收入的平均值。两个假说看起来差不多,但推导出来的理论和政策含义却相差很大。这些研究都是总量分析,对于消费者个性化的消费方式没有深入讨论。

研究消费最有趣的经济学家是 19 世纪末美国制度经济学的祖师爷索尔斯坦·维布仑。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怪人(后来转向芝加哥),当年亲眼看到“镀金时代”的“强盗大亨”们沿着曼哈顿公园大道和河边街大肆构筑豪华宅邸,疯狂追逐时髦消费品,消闲、享乐、游手好闲、鄙视劳动成为有产阶级的道德取向和生活规范,灵感迸发,写出了《有闲阶级论》这本经济学奇书,让“炫耀消费”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不朽术语。

维布仑把有钱人疯狂追逐豪华消费的动机和欲望等同于原始野蛮人抢夺女人。他认为有闲阶级无休止地追求消闲、享乐,已经摧毁了健康社会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劳动不再是人们赞颂的美德,而成为唾弃的对象,有闲阶级天生对“艰苦而粗俗的体力劳动有着本能的反感”。维布仑的结论是:炫耀消费加重社会两极分化,激化社会矛盾,有闲阶级是整个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维布仑的理论生动而有趣,但并不完全符合当时所谓强盗大亨的消费模式。不可否认,像洛克菲勒、摩根这些世界级富豪的生活方式足够奢华,但他们的绝大部分钱财却没有用于炫耀消费,也没有遗留给子孙后代挥霍,而是通过对文化、艺术、教育、医疗的赞助,转化为社会性生产资本(尤其重要的是人力资本),为美国的富裕和强大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摩根在整合美国产业、为企业筹集资金之余的最大理想是,要把欧洲和世界最好的艺术品买到美国,让美国成为一个不仅物质上富裕,而且精神上也充实的国家。他一趟又一趟地前往欧洲和埃及,用自己的资金一手创办了世界著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最后死在寻找意大利艺术品的旅途中。

洛克菲勒的一生最充分体现了一个顶级富豪如何为国家 and 人民做出巨大贡献。荣·切尔

诺在《工商巨子——洛克菲勒传》中指出：洛克菲勒是维布伦有闲阶级最好的反例，他一生爱好艰苦劳动，从来不涉足无聊的享乐和奢侈。洛克菲勒具有异常强烈、极其虔诚的宗教信仰，他相信自己无与伦比的赚钱才能是上帝赋予的，“与他人无关”。更重要的是，他相信上帝让他赚钱的目的是要“让我把钱花到应当花的地方”，那就是拯救人类。而拯救人类只有两个途径，一是从身体上给人以健康，二是从精神和知识上让人摆脱愚昧（与我们鲁迅先生的观点一致）。洛克菲勒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一手创办了芝加哥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还资助了其他许多大学和无数研究项目。洛克菲勒对人类医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世人皆知（包括中国著名的协和医科大学和协和医院），而芝加哥大学百多年来在人类科学进步上的卓越成就，让我们领略了“善用钱财”的简单哲学理念对人类进步将有多么巨大的推动力。

稍微观察一下今日中国的消费社会，可以看到无数有趣甚至千奇百怪的消费现象，维布伦式的炫耀消费触目皆是。房子越贵就越有人买，什么意大利式、法国式、英国式、拉丁式的别墅，什么 City house、town house、豪华公寓，价钱越高越是有人问津，就像电影《大腕》台词中所说：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吃的就更邪乎了，全国各地的菜系互相攀比，争奇斗艳，花样翻新之快、噱头变化之速，绝对是世界之最。真正应了那句老话：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但是奇特的还是娱乐享受，中国迅速滋生的奇奇怪怪的娱乐项目，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

很不幸的是，在极尽奢华的炫耀消费之余，我们却没有看到多少人为教育、科技、艺术与文化掏钱。有人说是体制和制度上的原因制约了人们进行长期投资、资助科学创造。不可否认，体制和制度是重要制约因素，但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念和世俗生活方式（中国人大多没有强烈的宗教情感，追求现实享乐而不修来世），无疑是奢华享受的重要根源。连费正清这样的学者也注意到：中国人赚了钱之后，只有两件事好做，一是购地买房，一是娶老婆、养女人。好一点的也就是送孩子读读书，或者捐一个官衔。胡雪岩是无数中国商人的崇拜偶像，他娶了十几房姨太太，破产之际将姨太太慷慨送人的故事为许多人津津乐道，而他善于周旋官场、最后成为红顶商人的传奇，就更是众多中国商人效仿的榜样。但胡雪岩事业顶峰之时，也没有看到他像西洋商人那样资助艺术和教育。辜鸿铭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怪才。20 世纪初，他有一篇著名的演讲《政治经济学的真谛》，批评西方政治经济学只关注“*How to make money*”，而不关心“*How to spend money*”，说西方经济学只对了一半，并极力推崇中国或整个东方的消费观。恰好在这一点上，辜鸿铭只对了一半：的确，西方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赚钱，但中国人的消费方式却一点也不比西洋人强。我们的科学这样落后，教育如此惨淡经营，是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根源的。

单纯

对于心的境界，我所能够给出的最高赞语就是：丰富的单纯。我所知道的一切精神上的伟人，他们的心灵世界无不具有这个特征，其核心始终是单纯的，却又能够包容丰富的情感、体验和思想。我相信，每一个精神上的伟人在本质上都是直接面对宇宙的。

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只是宇宙的儿童，这种认识深藏于他的心灵的核心之中，从根本上使他的心灵永葆儿童的单纯。另一方面，他对宇宙的永恒本质充满精神渴望，在这种渴望的支配下，他本能地为一切精神事物所吸引，使他的心灵变得越来越丰富。

与此相反的境界是贫乏的复杂。这是那些平庸的心灵，它们被各神人际关系和利害算计占据着，所以复杂；可是完全缺乏精神的内涵，所以又是一种贫乏的复杂。

除了这两种情况外，也许还有贫乏的单纯，不过，一种单纯倘若没有精神的光彩，我就宁可说它是简单而不是单纯。有没有丰富的复杂呢？我不知道，如果有，那很可能是一颗魔鬼的心吧。人性的单纯来自自然。有两种人性的单纯，分别与两种自然相对应。第一种是原

始的单纯，与原始的物质性的自然相对应。

儿童的生命刚从原始的自然中分离出来，未开化人仍生活在原始的自然之中，他们的人性都具有这种原始的单纯。第二种是超越的单纯，与超越的精神性的自然相对应。一切精神上的伟人，包括伟大的圣徒、哲人、诗人，皆通过信仰、沉思或体验而与超越的自然有了一种沟通，他们的人性都具有这种超越的单纯。

在两种自然之间，在人性的两种单纯之间，隔着社会和社会关系。社会的作用一方面使人脱离了原始的自然，另一方面又会阻止人走向超越的自然。所以，大多数人往往在失去了原始的单纯之后，却不能获得超越的单纯。

社会是一个使人性复杂化的领域。当然，没有人能够完全脱离社会而生活。但是，也没有人必须为了社会放弃自己的心灵生活。对于那些精神本能强烈的人来说，节制社会交往和简化社会关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越过社会的壁障而走向伟大的精神目标。

幸福的机会成本

人生在世，人人都想活得更好，更好地活着，而所谓“选择”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在各种可能的条件下，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大幸福或满足的较好的活法。

幸福或满足这样的概念，经济学中的术语是“效用”，实在是一个意义广得不能再广、泛得不能再泛、一般得不能再一般的概念。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天下有太多的东西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或满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什么也不干，也是一种满足。什么也不干，也就是闲在，经济学里称为“闲暇”，文雅一点说是“闲适”。除了家财万贯、可以不干活也有吃有穿的真正“有闲阶级”之外，我们社会里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真的什么也不干，至少还得挣钱吃饭。

但有的人完全可以既不求升官，也不求发财，不去劳心费神上学考试搞什么理论研究、发明创造，拣个费力最小、工资说得过去的工作，每天上班安分守己做好本职工作，下班按时回家，世界杯足球赛时蹲在家里看电视直播，星期天携妻带子逛公园商场；年轻的时候跑步，年纪大点练气功，身体精心保养，不熬夜，不发火，延年益寿。

这种所谓的“平民生活”，说起来显得“平庸”，其实那当中的一份“闲适”能给人带来的满足，并不一定就比整日奔波劳累、费心耗神求得的功名利禄所能带来的满足少几分。

只计算物质产出或物质享受，不将“闲暇”考虑进来的经济学，只是一种简陋的经济学。闲暇可以提供满足的道理，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可以首先把我们引到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基本的意思就是有一得，有一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经济学的老祖宗、英国的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大意）：国王会羡慕在路边晒太阳的农夫，因为农夫有着国王永远不会有安全感，而你要像农夫那样的安全感就不能有国王的权势。

不过，经济学中“机会成本”概念的意思要更狭一些，它往往特指在“资源是有限的”这个前提下，将一种资源更多地用于这一目的便不能更多地用于另一目的，经济学中最普通的一个例子就是“黄油与大炮”：一个国家总共有那么多的资本和劳动，既要生产黄油（消费品），又要生产大炮（武器），多生产了一吨黄油，就要少生产（比如说）两门大炮。这时那少生产的两门大炮，就被称为多生产一吨黄油的“机会成本”。

一个人生到世上来，至少拥有一种“天赋的”资源，那就是时间，每天 24 小时，每年 365 天，一生几十年，就每一个人来说，时间资源对他总是有限的，多有多有限，少有多少有限，因此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所能干的事情就是有限的：读书了就不能看报，打牌时无法打球；今晚要去官场上应酬，就无法到商场上去交易；要想做学问，就得多花工夫多读书，你就只能有较少的时间去经商挣钱或开会升官。

在所有的情况下，人们要干成一些事情，至少面临着一种机会成本，那就是闲暇。鲁迅的一句引用率相当高的名言是：所谓天才，就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到读书上去罢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功名利禄、成就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讲并不难，有一正常的平均的智力水平和身体条件，都能得到，只不过要用勤奋、辛劳，也就是用那喝咖啡的时间去交换罢了。至少，你得一边读书(或谈买卖，或开会)一边喝咖啡，而不能坐到露天咖啡座的阳伞下一喝两个小时，优哉游哉地观赏路上的行人、天上的飞鸟。要挣钱就要四处跑买卖，看摊一看十几个小时；要升官就要多花时间搞调查、编计划，四下联络感情，八方打探消息；要做成点学问就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搜集资料，完成实验，一睁眼就想到哪篇文章还没写，哪段讲义还没编，恨不得做梦也能做出个搞实验的新招，于是要么是整天在外，半夜才归；要么是挑灯夜战，不近人情；星期日不放假，节假日不休息，不陪老婆进商店，不陪孩子逛公园，女友告吹，夫妻吵架，第三者插足。

就一般情况而论，你多得一份功名利禄，不过少得一份轻松悠闲罢了。有的人条件特别好，运气特别好，什么事都似乎信手拈来：坐在家里不动，好买卖会自动找上门来；什么政绩也没有，可阴错阳差地官运亨通；学问不大，瞅准个空子，一个新点子也成名成家。这些情况当然有，但不仅是例外，而且其实这样的人即使发了点财也不会成为巨富，当了大官也不会是伟人，出了名也做不出大学问。靠勤奋不一定成器，靠运气和小聪明也能成名，但对于一般情况来说，不花点时间和精力是办不成什么的，且不说那努力过程中的种种煎熬。

经济学中有这么一种算法：把一个人一天的可支配时间(自然时间减去8小时的必要睡眠时间)，或一生的可支配时间(从自然年龄中减去不能工作的少年和老年期)，算做一个总数，然后给出一天工作所能获得的收入标准，让你自己去选择究竟是多干点活，还是多享受点悠闲。这种算法明确地告诉你：你想多干成点事，就得少一点闲暇的享受。

做事情的机会成本是闲暇，反过来说，闲暇本身也有它的机会成本。比如说一个人什么事不做，或者做得很少，倒是舒服自在，但因此也就成就不了什么事业，比如说挣不到更多的钱，得不到更多的物质享受，看着别人有钱买这买那、出门旅游，而自己只能最多沏一杯茶在家里享受“清淡的闲暇”。机会成本概念的核心在于，什么事情也不是都好都坏，而是有利有弊、有得有失。

机会成本的概念具有普遍的意义和适用性，就在于可以说什么事情都有它的机会成本。我们上面仅仅是就“时间”本身谈问题，还没谈为做成一件事所需付出的其他代价，比如“痛苦”或辛苦，从这些代价当中，我们更可以了解机会成本的无所不在。为官当政，有权有势，万人之上，又有一种干国家大事的感觉，但所受的约束也大，上下左右都要小心谨慎；搞学术研究，“臭知识分子”一个，相对来说却有可以保持较大的个性的自由，自己写了东西签上自己的名，用不着看上司的脸色；自己当老板开公司，可以更大地发挥才干，赚了钱拿大头，但操心也大，每天要忙于生意，还要承担赔本的风险；做个小职员“打打工”。虽然要看老板的脸色行事，但不操那份心，这时你也就不能抱怨为什么别人比你更有钱。

为什么上大学

我来告诉你一件我的教师生涯中最早的一次令我啼笑皆非的经历。

那是1990年1月，我刚刚从研究生院毕业，开始了在一所大学的第一学期的教学工作。一个高个子的男生来到了我的课堂，坐了下来，两臂交叉往胸前一放，看了我一眼，好像在说：“好吧，哥们儿，教我点什么吧！”两星期后我们开始上《哈姆雷特》，三个星期后的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双手放在臀部，“你要知道，”他指着桌上的书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成为一个药剂师，可是为什么还非得学这个？”

虽然我是一名新教师，我也完全可以告诉这名学生，他现在上的是大学，而不是技术培训学校，在大学里学生应该接受的是教育而不仅仅是培训。我试着这样向他解释。我说：“对于你今后的日子，平均每天大致 24 小时。这 24 小时中，大约有 8 个小时要睡觉，你既不需要培训也不需要受教育就能安然地度过你生命中的这三分之一的时间。

“每个工作日的大约 8 个小时里，我希望你能从事有用的职业，假设你读完了药学院或是工学院、法学院甚至别的什么学院，在工作的 8 小时里你就可以完全地应用你的专业知识，在你生命的这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你当药剂师的责任就是不把氯化物弄到阿司匹林里去，当工程师你就不能计工程失控，当律师就要做到你的当事人不因你不称职而上电椅。这里面包含了每个人都尊重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都能给你良好的基本需求。除了满足其他的需求外，这些职业将来会是你餐桌上的食物，养活你的妻子，抚育你的儿女。职业是你的收入的来源，祝愿你的收入永远够用。

“那么还有另外 8 个小时的时间，也就是说你生命中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你怎么度过？还是回头说说你的家庭吧！你要把你的子女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孩子们能够接触到高深思想吗？我们都自认为是一个伟大文明社会的成员，文明社会只有保持其创造性，才能存在。将来你成为一家之主的时候，你的家庭是否对整个人类文明思想有起码的了解？或者你家庭生活的内容只有冰镇啤酒？你的家里是不是应该有些书呢？或者说应该有些画？你的家人能不能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不能就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发表意见？你的孩子能不能有机会听到巴赫的音乐？”

我说的大致就是这些，可是那个学生根本就不感兴趣。“得了，”他说，“你们这些教师有你们教育孩子的办法，我有我的一套。至于我嘛，我要赚大钱。”

“我愿你赚好多的钱，”我对他说，“因为你若不赚钱买东西就会难受。”

4 年过去了，我仍然在读书，我在这儿想告诉你的是：大学的任务不仅是对你进行培训，还要向你介绍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如果你不抽点时间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学点最基础的哲学，学点艺术，学点我们称为历史的人类发展的过程，那么你不该来上大学，你就会成为一个只会使用机器的人，一个会按电钮的人。

谁也不可能没有人帮助就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自己去创造成为文明人应有的一切知识，一辈子的时间也是不够的。你们今天的年轻人，只要在中学的物理课上没有完全地睡觉，就比过去那些大科学家的物理知识强。你之所以比他们知道得多是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知识留给了你。任何科学的最初的过程都必然是一个历史过程，你必须去学习那些前人学到并留传给你的知识。

人类技术的发展是如此，人类精神财富的积累也是如此。书籍中包含着绝大多数技术的和精神的资源。在你读一本书的时候，你就在增加着你的人生阅历。读一读荷马的史诗，你的头脑里就有了荷马的一些思想。通过书，你至少能获得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等无数前人的一点点思想的火花。因为一部伟大的著作就是一份厚礼，它使你经历一些你一生中从来没有时间来经历的生活，它把你带到一个现实中你没有时间去游历的世界。一个文明人的头脑里包含许许多多这样的生活经历和这样的世界。如果你急着去赚钱，或者对自己的无知甚为得意，从而把亚里士多德或爱因斯坦的思想这些能提高你的思想素质修养的礼物拒之门外，那么，你将我认为，要是一所大学不能使你们学生——无论是作为专门人才还是普通人物——去接触那些你们的头脑中应该有的那些大师的思想，那么，这所大学就没有真正的办学宗旨。而你们自己若没有努力去吸取那些大师的精髓的意图，那么，你们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文明

人。

既然无论是作为大学还是作为大学生，都没有对这个文明社会所具有的文明起到传承和推动的作用，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文明的社会来说，两者也就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位置

社会位置的坐标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一种社会的位置。这个社会位置，应当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它水平面上的位置，但我今天讲的，主要是在一个垂直等级序列里的位置。我们看到，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人们要改变自己的位置，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比如说像一个农民的孩子，他要想改变自己的位置，那几乎就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当兵，再一条就是上大学。上完大学以后，你基本上可以按照干部身份来分配。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农民，他几乎没有其他的途径来完全改变自己的身份。

改革开放以后，基本上有三大序列，也就是说，人们社会升迁的道路，变得宽广了、多样化了。你会看到，这个三大序列，一个是经济的，就是以财富和收入来衡量；第二个序列，是行政序列，仍然是以组织权利等级来划分的；第三个序列，就是社会声望，以社会声望来衡量。

所以，不同的人，由于他所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大家就不是在一条道上挤得人仰马翻了。你可以去创业，你追求的是这种事业上的成功，你追求的是收入和财富；你也可以在行政序列上凭着你的努力，然后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另外呢，你还可以当演员、当教授，他们是追求一种社会声望的序列。这就是说，道路很宽广了，这时候你会看到，人们改变社会位置的这种能力大大地加强，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他们凭着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位置；也有很多的干部下海，在这个序列走不通，我还可以走另一个序列。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这三个序列，发生了一些错位，这个错位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这三个序列，应当有一个相关性。就是你在某个序列比较高的人，你在其他序列当中，也应当有一个相当的位置。不应当出现在这个序列很高的人在另外一个序列里面很低，这种现象应当是不正常的。比如我们看到一些老板，他们在经济和财富的序列里面，位置很高。但是，他们心理也不平衡，就是说，你看看一到社会声望的调查里面，他们的地位，给他们打分打得都很低。前两年有特别的一个现象，出租车司机普遍被人们列入高收入阶层。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我记得一般的机关的公务人员，每个月也就是六七百块钱的样子。那时候一个出租车司机大概每个月收入就达到四五千块钱。所以，那时候叫做高收入阶层，那么这种现象，我觉得就不是太正常，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从来没有说出租车司机是高收入阶层的。

那么现在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很多的公务员的工资、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都在上升。但是，出租车司机，应当客观地说，这些年来，收入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在下降，因为竞争加剧了。

一个重大的趋势和变化

我们看到，在未来社会当中，一个重大的趋势和变化是什么呢？那就是，虽然我们说存在着不同的序列，但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是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在所有的这些影响人们社会位置的因素当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他的序列也将受到这个序列的重大影响。比如说像老板阶层、企业主，在十年以前的时候，他们的平均文化水平是比较低的。所以那时候，大家会说什么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什么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等。但是，今天情况已经不是这个样子，在整个老板阶层当中，一大批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员参与进去，就使

这个行当慢慢地竞争激烈，你没有这方面的技能，你就很难再重新加入进去。仅仅凭着创业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公务人员、大量的干部，也在追求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当然，也不能排除很多人就是拿文凭，就是为了图个虚名，自己也不去上，交了钱以后，找个人代听，最后拿个文凭，这种现象也很多了。但是在这种气氛中，你会看到，他要追求这个东西，是因为这种东西能给人家一种信号，你的专业技术能力的一种信号。

因为在现代社会当中，你找工作的时候，人家不可能先去调查你的历史，然后再让你实践半年，我最初获得的你的能力的信息，无非就是这几个东西：文凭、资格证书，再就是你的简历。所以现今很多的青年人找工作，虽然这些工作很辛苦，工资待遇可能也不是特别高，但是他愿意在那儿干，为什么？他觉得这个位置未来有发展前景，说我不是为收入打工，我是为我的前景、为我的履历表打工，以后找工作时，你看，我在某某地方工作过。那么，你能在那个地方工作，就提供了一份信任，提供了对你的知识技能的一份担保。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专业技术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挡得住的。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现在教育这么热火？已经连续几年扩大招生，但是，现在仍然是供不应求，现代教育已经完全不仅仅是一种业前教育，大概以后慢慢要成为一种终生教育。2001 年招收的年龄最大的大学生，已经到了 62 岁。另外，你也会看到，教育仍然是一个垄断市场，就是说它的价位还是太高，参与竞争的人，还是太少。

当然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在我们最近做的一种求职的调查当中，就发现在这个转轨的时期，人们找工作社会关系还是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所以说，你认识谁，这个人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你要通过什么样的社会影响，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这个市场现在还发育得不是太完善，所以，在所有的调查当中，通过亲友的渠道来找到工作，还是一个主要的途径。但是，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调查显示，还是由你的专业技术能力决定的。就是这个人可以介绍你到那里去工作，但是，我总不能介绍你一个小学文凭的人去当经理吧？所以说到底找到什么样的位置，主要靠你个人的能力。

保护好你内心的梦想

在未来的社会当中，在我们中国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如果说要建立一个有序的、合理的社会位置体系的话，那么，它起码应该满足这么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影响和决定你这个位置的，应当是一个，我们叫做获得性的因素主要起作用，比如说你的教育、你的努力程度、你的能力、你的专业技术，还有你对机会的选择和把握，等等。而不能是我们讲的继承性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你的出身、你的家庭背景，等等。如果是这些因素成为影响人们社会位置的主要因素，那么，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具有活力的。第二个条件，建立这么一个合理的体系，必须是人们获得这个位置，和他付出的成本是要相匹配的。就是说，你付出的有多大的努力成本，比如说，你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那么，这些教育里面是有成本的，你要交学费的，你学习期间，你要吃、要住，而且这是你直接的成本，还有很大一块机会成本，就是说你上学期间，你是不能挣钱的，你丧失了在这方面挣钱拿工资的机会。这两块成本加起来，是你受教育的总的成本，你付出这么大的成本，后来你得到的这个位置，还没有小学文化水平的那个人获得的收入高，那么，人们谁还去受教育？所以，一个社会应当造就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应该得到的人，他能够得到。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有活力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够凭着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实现自己的抱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中国梦，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充满活力，而且前途无量。

总之我觉得，在未来，肯定是每一个人的梦想在改变着他的位置。

管制与腐败

管制本身需要大量成本，例如管制机构的设立、人员经费、制定管制规则、实施管制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衍生成本。管制的额外成本

首先，带来收入的再分配。

比如办一个企业，原本只要注册就行了，但现在必须先得到政府部门批准。我办这个企业一年可以赚 100 万，得到你批准还是赚 100 万。但是，为了得到你的批准，我必须贿赂你，还得额外“投资”50 万。

收入再分配会带来效率损失。为了贿赂你，我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啊！这里面的交易成本太高了。如果可以直接用钱买你这个权力，还算是好的，但你怕人家抓住，所以还得搞好多名堂来掩盖贿赂行为。

比方说我是生产汽车零部件的，用汽车零部件怎么贿赂你啊？给现金你又害怕，怎么办呢？来个桑拿浴吧，然后经常请你去洗桑拿。这样创造出各种各样变相的贿赂手段，成本进一步增大了，我用在事业上的时间就更少了。

我们可以将由政府管制所造成的这些成本分为两类，一类叫“固定成本”，是一次性的费用；另外一类是每年都得交的成本，类似于可变成本，例如管制者每年都要“年检”。这两部分成本一部分表现为资源、现金形式，另一部分是时间形式。两部分的损失都很大，其中时间的损失可能更大。

现实中管制成本究竟多高？有一个事例可见一斑。北京市科委确定了一个软科学课题，研究北京的投资环境，课题经费 80 万。研究部主任把这件事交给两个年轻人，说你们去注册一个公司吧，注册完公司你们就知道北京的投资环境如何了。结果半年下来，报告主任说 80 万已经花完了，公司还没注册下来。

我听香港投资家讲，如果他们来大陆投资 500 万，大概要准备 200 至 300 万打通关系，真正用于投资企业的钱就少多了。

反腐败的成本

各国经验表明，只要存在政府管制，腐败问题就会使之而来。这是因为腐败主要是权力造成的，管制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政府获得权力之后，这些权力最初的目的和它的使用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样。好比说我们授予管制者权力，本是出于非常善良的目的，希望它维持市场秩序。但是管制者有了这种权力之后，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别人必然会来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

为什么会有贿赂行为？权力在你手里可能分文不值，因为你不能直接使用这部分权力。现在我送你 1000 万，拿到这个权力后，我可以捞 2000 万，也就是说，这个权在我手里值 2000 万，除去贿赂成本我还可以赚 1000 万。

权钱交易对贿赂者和被贿赂者来讲是“帕累托改进”，但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种损失。譬如有人能用这个权力创造 3000 万、4000 万，但他们的贿赂渠道不畅通，得不到这个权力，这样，社会资源当然没有用好。

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不同之处在于，官员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诱导他，使得官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变成对社会利益的追求，因此官员们利用管制权力谋取自己的私利，就容易构成社会的净损失。

管制与腐败

管制与腐败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关系，而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关系。

第一，权力具有互补性，也就是说一种权力的使用价值依赖于另外一种权力的使用价值。比如你只有批准左鞋的权力，也许没人贿赂你，因为只生产左鞋没有什么用。但如果你既有批准生产左鞋的权力，又有批准生产右鞋的权力，那你受贿赂的几率就大多了，因为从你这拿到的权力更值钱了。

第二，权力越大，监督成本就越大。好比说管制者只有审批土地的权力，那么大家都盯

着土地的审批。但如果管制者同时又有审批出租车的权力，还有合资项目的权力，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就眼花缭乱了，人们很难弄清楚管制者这么多权力使用得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

为了防范管制中的腐败，政府事先一般都会制定若干规章制度。比方说审批权不能在一家转，而要经过几道关口，涉及更多部门，免得权力集中，容易被人滥用。据说，深圳海关的工作人员上哪一个岗要抓阄决定。因为固定上一个岗，你就可能事先跟不法分子约好，搞走私，另外还规定上岗以后不能打电话等等。

发现了腐败嫌疑分子，政府要去弄清来龙去脉，搞清楚贪污多少、受贿多少、挪用多少。

这些反腐败成本，包括事前的防范成本，事中的监督、制约成本，如查账啊什么的，以及事后的处理成本，最后落在两部分人身上，一部分是“消费”管制规则的人，另一部分是社会公众。无论哪一部分，都是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

信誉机制丧失的成本

管制导致信誉机制丧失，也会增加交易成本。本来我和客户之间的合同可以很简单。现在管制破坏了信誉，我们不得不签订一个非常复杂的合同，再加上可能发生的法律诉讼成本，交易成本一下子增加不少。

宝洁公司曾经谈道，在其他国家做生意，他们最重要的事就是开拓市场，但在中国，他们不得不成立一个非常庞大的“打假队”，由一名副总亲自主管，专门对付假冒伪劣。

由此导致国家声誉受损的成本也不可忽视。类似宝洁公司的情况，假如国外公司知道了，本来准备到中国来投资的，现在可能不投了。

值得警戒的是，管制太多并消灭了信誉机制后，往往要靠不断地强化管制来维持经济运行，因此管制成本有可能呈现几何级数式的扩大。

当被管制者变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会以维护社会利益的名义要求政府不断加强管制，来保护自己。这些法定垄断者没有挑战者，没有监督者，不会受到威胁。尽管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不兼容，却会编出好多说法，证明市场是多么的不完善，管制是多么的好，多么的重要，糊弄老百姓。所以管制的自我膨胀是很自然的。

弗里德曼以前讲过，印度那些大商人老告诉政府，竞争不好，垄断好，看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是竞争对他们不好。

管制者会从供给一方推动管制的膨胀。施蒂格勒曾经分析过“管制俘虏理论”，证明管制者和被管制者到最后，本身变成了管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总是会找到更多的借口，建立起更多的规则，利用政府赋予的合法权利来创造出更多的管制来。仅这一条就使得管制完全变了味。

这里我顺带说一下，就是好多地方政府，名为保护“地方利益”，实际上保护的并不是地方利益，而是地方官员利益，顶多是地方某些得到利益部门的利益。武汉人买桑塔纳车要多付几万元，据说是为了保护地方利益，其实是保护了地方一部分生产者的利益，并以损害地方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

人情超级大国

在很多异域人眼里，相对而言，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富人情味的民族，一个“和为贵”的民族。中国人总是以家族道德和家族感情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本，即便在现代工业和现代商业的风暴中远离家园，进入了高度流动和完全生疏的社会，进入了以货币兑换人情的服务网络和以法规取代人情的公约体系，也常常不耐“人情淡薄”的心理缺氧，常常会在新的环境里迅速复制出仿家族和准血缘的人际关系——领袖是“爷爷”和“爹爹”，官员是“父母”，下属是“子弟”，朋友和熟人成了“弟兄们”，关系再近一步则成了“铁哥们”、“铁姐们”。这种现象在现代军队、工厂、乡村、官场以及黑社会中皆习以为常。公事常常需要私办，合

理先得合情。一份人情，一份延伸人情的义气，既要吃掉半个民主也要吃掉半个法治。这样看来，中国茶楼酒馆里永远旺盛的“吃喝风”，醉翁之意其实不在肠胃，而在文化情结的恒久发作，是家族亲情在餐桌前虚拟和重建的物态表现。中国式的有情有义，意味着有饭同饱，有酒同醉，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同时也常常意味着有话打住，有事带过，笔下留情，刀下留人，知错不言，知罪不究，以维护既有的亲缘等级（讳长者或尊者）与和睦关系（讳友人或熟人）。很多司法机关之所以办事效率不高，结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取证难。好些中国人只要与嫌犯稍沾一点关系，根本算不上家属亲友，也开口就是伪证，没有几句真话。这种“见熟就护”的官官相护或民民相护，往往导致司法机构在财力、物力和人力方面的大量耗费，悬案、呆案和死案的大量积压。民主需要成本，法治需要成本，光人情成本一项，一旦大到社会不堪承受，人们就完全可能弃民主与法治之昂贵，转而怀念集权专制的简易。解决纠纷时宁愿走“黑道”而不愿意走“白道”，遇上贪官横行就期盼尚方宝剑和最高指示下的残酷整肃，这都浮现出传统政治的幽灵，表现出欧式民主与欧式法治植人中土后的机能不适，是制度手术后的文化排异。我们很难知道这种排异阵痛还要持续多久，还要发展到什么状况。事情是很复杂的。我们也很难知道中国的人情传统何时瓦解，或者应不应该完全瓦解。据实而言，人情并不总是有损公正和效率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并没有主流传媒上常说的“穷了几千年”，中国人曾经创造了十几个世纪的绩优农业，直到十八世纪还有强劲的“中国风”吹在西方，来自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以及茶叶风靡一时，令欧洲的贵族趋之若鹜，就像今天进入中国的劳力士手表和皮尔·卡丹时装一样成为奢豪的象征。中国人也曾经创造了十几个世纪的绩优政治，排除世袭背景的开科取士，避免封建分割的文官政府，直到十八世纪还启发着欧洲的政治精英。在这十几个世纪之中，大体而言，一份人情不是也没怎么坏事嘛？

即使到了社会化生产的现代，人情常常导致理法的松弛和扭曲，但有时也有超理法的魔力。认人、认情、认面子，就足以使有些团队（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是这样）团结如钢，披荆斩棘，所向无敌。有些“父子档”、“夫妻店”以及一些“贤人魅力”下的经济奇迹皆可为证。这并不是一个小数，也恐怕难以统统归之偶然。特别是在社会遇到风险和危机的时候，人情更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安全网。公私界线不清，故百姓揩了公家的油或公家剝了百姓的肉，都可以忍着。公公界线不清，故法人“三角债”或“N角债”能清则清，清不了也肉烂在锅里共同混过而不是渡过难关。私私界线不清，于是子女下岗吃父母的，本家吃完了吃亲戚的，亲戚吃完了吃朋友熟人的，反正天无绝人之路，七拉八扯也能混个日子，说不定还能买个彩电或者搓一手麻将，甚至出外喝茶时还顺手给邻桌的哥们儿偷偷买一下单，留给哥们儿结账时一份惊讶和温暖。这种民间的和隐形的大规模财富调节转移，拿到美国行得通吗？很多美国人连亲人周末吃饭也得从制，还能容你们这些人情蒙面的大盗来打家劫舍？

很多西方观察家敲敲计算机，凭着大堆数据一次次宣布中国即将崩溃，但后来又一次次困惑地发现，事情常在他们意料之外。这个闹哄哄的大国问题严重居然就是垮不掉。他们的传统里没有人情的地位，也就拿不准中国的脉，因此既可能把中国的难事当作了想当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国的易事当作了难事。

中国没有求富求强乃至求霸的充分经验，改革和发展常常如老牛负重；但承受和缓解危机实有丰厚的习俗资源，算不上什么难事。

第二章 流行是恶俗的通行证

感动

有那么一些人，看到老农在地里割麦子，他感动；看到小孩在广场放风筝，他感动；看到环卫工人在清晨扫马路，他感动；看到一对老年人在黄昏时分手牵着手散步，他感动；一片树叶落地，他感动，一阵微风吹来，他感动……于是，有一本书就叫做《常常感动》。由此可见，“感动”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心理症候，泪水也像自来水一样哗啦哗啦地随便而廉价。前不久我看一篇文章，劈头就给了这样一句：“吃下一口哈根达斯冰淇淋，我对生活油然而生一种感动之情，于是我泪流满面……”

流浪

除了“感动”，现在还流行“渴望流浪”、“享受孤独”……从杜拉斯的《情人》到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从凯鲁雅克的《在路上》到海明威的《非洲的青山》，从三毛的《橄榄树》到谢金玄的《跟徐志摩去流浪》，流浪被不断地美化着。诗意着，于是，城市里出现了“飘一代”。

当小资们“跟徐志摩去流浪”的时候，那些含辛茹苦的打工仔似乎也不甘寂寞，自己本来挺累的，却喜欢常常就把“漂泊”、“流浪”这样的字眼挂在嘴边，然后还“在城市的天空下，我们不相信眼泪”，把自个儿搞得跟诗人似的。

酱子

“哦，原来是酱子呀……”

“好啊，那就酱子啦……”

“哎呀，不要酱子嘛……”

“其实我蛮相信缘分的酱子……”

“我最喜欢妈妈做的菜酱子……”——那么，究竟是什么“酱子”？北京的豆瓣酱还是四川的豆豉酱？

原来，“酱子”是台北口音里“这样子”的连读，徐怀钰“酱子”，痞子蔡“酱子”，F4也“酱子”……在全国数百种地方语言里，没有比奶声奶气的台北口音更适合撒娇的了。小资作为一个酷爱撒娇的社会阶层，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小嘴儿撅得超出鼻子至少3厘米以上，动不动就酱子酱子的。

吐司

咱们说“谁动了我的奶酪？”，小资却说“谁动了我的起司？”他们还喜欢把面包叫做“吐司”，把“番茄酱”叫做“沙司”如果说“I服了You”是一种“散装英语”，那么，“谁动了我的吐司”则是一种“二手英语”。

美金

一位青春偶像级的哪CEO对记者说：“我在衣服方面其实不太讲究，我的牛仔裤68美金，鞋子100美金，很少的花费。”但是，如果兑换成人民币，他的花费也不算少啊！他到底想告诉人们什么？不太讲究还是讲究？

精神没有丢

0：2负哥斯达黎加队，0：4负巴西队，0：3负土耳其队……我还以为中国队输了呢，但是，面对记者的话筒——一位球星说：“我们的精神没有丢！”

一位官员说：“我们的精神没有丢！”

一位国嘴说：“我们的精神没有丢！”

一位球迷说：“我们的精神没有丢！”

于是，报纸上、电视上、电台里，人们都在说：“我们的精神没有丢！”

总之，大家一致认为：中国队虽然“零进球”，但是我们锻炼了队伍，总结了教训，知道了差距，增长了见识，并且还换回了好几件巴西球星的球衣……

阿Q他老人家若有在天之灵，他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我的精神没有丢啊！”

零收费

大约是从李响的“零距离”开始，“零”迅速成为一个十分流行的形容词。什么“零首付”、“零考试”、“零收费”……“世界杯”期间还看到一篇报道的标题是《宋祖英“零身价”献身“世界杯”》。实际上，“零收费”不过是“免费”的意思，“零考试”不过是一个函授学校“免试入学”的意思，“零身价”也不过是原来的“义演”而已。

记得在钱钟书先生的短篇小说《猫》里，他形容李先生在太太心目中的地位时写道：“仿佛阿拉伯数字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因为任何数目加个零号便进了一位，所以零号也跟着那数目而意义重大了。”

现在看来，任何名词加个零号便进了一位，所以这个名词也跟着那零号而时髦了。你看，“世界杯”刚结束，不是有人又说了：冲国队“零进球”

质素

“质素”和“素质”的意思一样，只是因为港台那边管“素质”叫“质素”，所以，大陆这边的小资们很快也提高“质素”了。

非常

“非常”现在非常流行，什么“非常男女”、“非常爱情”、“非常感觉”……

然而，我觉得这非常无聊、非常讨厌、非常扯淡……

论址

过去流行“研讨会”、“博览会”……而自从“财富论坛上海年会”、“博鳌亚洲论坛”之后，许多会议都改叫“论坛”了。

据说，广东某乡镇企业前不久举行的一次电饭锅订货会，会名就叫“新世纪电饭锅论坛”，“论坛”的主题是：“健康、电饭锅和绿色生活。”

还是因为穷

澳大利亚报纸近日报道，北京有的免费公厕变成了洗衣房。有在那里洗头、洗袜子的，有把手纸、烟灰缸、挂画、拖把顺手拿走的，令管理人员叫苦不迭。丑出到海外了，真叫“臭名远扬”。这种现象在澳大利亚是不可想象的。澳大利亚城市里的公厕都十分洁净，地上墙上都擦得锃亮，气味也令人愉快。洗手池边有洗手剂，擦手纸和烘干机更不必说，有的厕所还有冷热水。由于公共场所不可抽烟，烟灰缸是没有的，也没有超前到挂画的程度。澳大利亚乡下的厕所我也去过，比城里的差些，但水、手纸和肥皂都是有保证的。因为人烟稀少，几乎没人去，把它拆了也没人知道，但从来没有人去洗头、洗袜子，也没有人会拿手纸。

我们的毛病远不止表现在公厕里。在机场登机时一拥而上的，肯定是中国人，老外则总是站得远远的，等急性子的中国人上完了再从从容容地上去。机票都是对号人座的，你急什么？我一直想不通：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国民怎么那么多毛病？是民族基因有问题？经过细心观察，苦苦思索，我得出结论：还是因为穷。我不得不承认，澳大利亚人的公共道德水平高。他们在几乎荒芜的自然公园里都守规矩，不乱扔东西。吃了苹果，蒂儿仍握在手里不肯扔，虽然周围并没有人。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也有乱扔废弃物的。有人将商店里的手推车扔在空旷处甚至推入小河里，还有的把自家庭院的树枝什么的垃圾堆到公共绿地里。那么，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到公厕里去洗袜子或把公厕里的东西带回家呢？因为没这个必要。

澳大利亚人从小生活在优裕的条件下，根本就没有“省一点是一点”的观念。他们学习、医疗都不发愁，住房可以贷款，没有什么大的开支可以叫人牵肠挂肚的。有了钱就玩，旅游、

爬山、冲浪、打球……谁会想到去厕所拿个脏兮兮的拖把呢？他们人少东西多，早去晚去都一样，脑子里也就没有争抢的概念。因此他们什么时候都那么有耐心，那么彬彬有礼，那么“温良恭俭让”，显得自己有教养。

经济的烙印是深刻的，它体现到每一个生活细节上。我们的人现在一般都穿得不错，尤其是出国，更是穿得好。然而，仔细一瞧，头发上有他自己体内的脂肪，因而不驯帖；衬衣领子，西服肩上总有不该有的东西，男人鼻子里的毛扎出老长。澳大利亚人的衣服普通，平常，宽松，舒适，一般场合不穿高档衣服，甚至常常在跳蚤市场买旧衣服穿，但总是干干净净的。他们每天早上洗一个澡，总像刚洗过的萝卜那样鲜亮精神。衣服多，一天换一件，攒几天用洗衣机洗一次。说他们多讲卫生，却不见得，我常见他们将买来的水果在衣服上擦一下就咬。有朋友甚至看到有人光着脚，拿起放在鞋子里的苹果就吃。他们追求的是形象，是体面。在一个群体里，吃没洗过的水果是自己的事，而邋遢则有损形象。他们有讲究形象的条件。住独门独院的 HOUSE，家家有个小锅炉，烧煤气，自动控制，一天 24 小时有热水。公寓房是集中供热，他们也不在乎那点水费，不会到公共厕所里去洗头洗袜子。

澳大利亚人还热心于志愿行动和慈善事业。植树，环保，灭火，踊跃得很。悉尼奥运会，志愿者争先恐后，很多老年人也精神抖擞，当然不是全部。有个驾教，给志愿汽车驾驶员们讲课，大赚了一笔。我问他为什么不做志愿者，他说：“不，没钱不干。”我又问为什么他们愿意。他告诉我，那些人想拿件有奥运会标志的衣服做纪念，以后好拿出来看看，说“曾经为悉尼奥运会服务过”。这老小子说完还骂了句“Shit”，是个粗人。澳大利亚慈善事业发达，已经成为调节社会的重要润滑剂。前不久，报纸上登了一头阿富汗动物园里骨瘦如柴的狮子，他们一捐就是几千万。能这样做，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最基本的是：生活富足。

人的生活，本来就分精神和物质两部分，物质在下，是根；精神在上，是花叶。根发达了，花叶自然茂盛。物质生活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追求精神的享受。文明、体面、尊严、仁爱、奉献等等，都可以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如果连肚子都填不饱，哪里有心思去追求精神享受呢？所谓人穷志短，也是常情。

谁更需要关怀

经济学上有个名词叫“边际效用”。翻阅卢周来的《穷人经济学》一书，看到了作者对这个专业术语的解释：边际效用，就是增加 1 个单位的某种物品消费，给人带来的主观心理满足程度。1 元钱的边际效用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一个倚门托钵的乞丐，你给他一元钱，他的满足程度可能是 100 个单位（假设心理满足程度可以这样量化）；而一个亿万富翁，你多给他 1 元钱，他的满足程度也许就只有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同样 1 元钱，因为给了穷人，社会总福利增加了 100，而如果给了富人，社会总福利仅增加了 1。作者说，从这个道理出发，社会收入分配应该偏向于穷人而不是富人才行。

书还没读完，便发现报上有几条消息可以和书一起读。一是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就车辆购置税有关问题明确表示，回国留学生购买国产小汽车可凭相关证明免税；二是长春市向 600 多位高级人才发放“人才龙卡”，龙卡具有特殊信用功能，持卡者可以在购物、购票等方面享受打折优惠。

恰好，报纸上又发了一条消息说，国家统计局首次披露城市家庭财产状况，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已达 22.83 万元。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家庭财产越多：户主文化程度为硕士及以上的家庭，户均财产为 49.94 万元；户主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的家庭，户均财产为 37.29 万元；户主文化程度为大学专科的家庭，户均财产为 30.43 万元。

看来，在中国，有幸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户均家庭财产总值高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分配就是财富分配”的道理。中国的